

中国文学编年史

隋唐五代卷

(上)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刘加夫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刘加夫

中国文学编年史

隋
唐
五代
卷

(上)

靈中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编年史. 隋唐五代卷(上、中、下)/陈文新主编;刘加夫(上)、熊礼汇 闵泽平(中)、霍有明(下)分册主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9

ISBN 7-5438-4531-8

I.中... II.①陈...②刘... III.①文学史—编年史—中国—隋唐时期②文学史—编年史—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IV.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7657号

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上、中、下)

责任编辑:李建国 胡如虹 曹有鹏

杨 纯 邓胜文 张志红 聂双武

特约编辑:熊治祁

主 编:陈文新

书名题字:卢中南

装帧设计:陈 新

出 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市场营销:0731-2226732

网 址:<http://www.hnppp.com>

邮 编:410005

制 作: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0731-2229693 2229692

印 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200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4 1/16

印 张:108

字 数:2,374,000

书 号:ISBN 7-5438-4531-8/I·448

定 价:804.00元(上、中、下册)

《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委员会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曹道衡 傅璇琮
霍松林

主编 陈文新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观海 李建国 汪春泓 陈文新 张思齐
张玉璞 於可训 赵伯陶 赵逵夫 胡如虹
诸葛忆兵 曹有鹏 熊治祁 熊礼汇 霍有明

本卷撰稿人

刘加夫

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现当代文学因时间周期较短，拟省略阶段，不设引言）。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

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曰：‘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暧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人，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入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

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明诗纪事》近三百万言，卓有建树，是研究明诗的必备案头书。但关于傅汝舟，陈田的确弄错了。郑善夫（1485—1523）号少谷，以学杜著称，学郑少谷的是正德年间的傅汝舟；文翔凤号太青，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与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两个傅汝舟之间相距约百年，陈田想当然地将二者合为一人，说他“享大年”，又说他前期学郑少谷，后期学竟陵派，曲意弥缝，令人哑然失笑。其他种种，如部分文学家辞典对作家生卒年的误注，若干点校本的断句错误等，我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纠正。提到这些情况，不是想证明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而意在告诉读者：我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编年史著述。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得到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书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专家和领导，尤其是武汉大学领导的支持；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鼎力支持编年史的编纂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陈文新

2006年7月23日于武汉大学



凡例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第五卷隋唐五代（中）、第六卷隋唐五代（下）、第七卷宋辽金（上）、第八卷宋辽金（中）、第九卷宋辽金（下）、第十卷元代、第十一卷明前期、第十二卷明中期、第十三卷明末清初、第十四卷清前中期（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下）、第十六卷晚清、第十七卷现代、第十八卷当代。

二、编年史各卷据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章（如无必要，或不分章）。章的标目方式是：“××章 ××年至××年，共××年”。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论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如明前期卷“第一章 洪武元年至建文四年，共35年”，在章目下，“洪武元年”之前，单列明前期卷“引言”一目。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如元代卷，在第一章前，单列元代文学“绪论”。

三、编年史各卷所收录内容的构架大体统一，重点包括七个方面：1. 重要文化政策；2. 对文学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3. 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4. 作家生平事迹；5. 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6. 争鸣（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7. 其他。

四、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俞宪编《盛明百家诗》成书”，再征引相关序跋、著录、评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文学史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必展开的文学史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

五、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不属同一年份，如公元1899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对应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而不对应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公历纪年，而以农历纪月，比如，凡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至十二月之内的内容均置于公元1899年下。作家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其他以此类推。现、当代文学部分，纪年、纪月均据公历。

六、同一年内之文学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

七、一部分重要文学史实，年月不详而仅知大体时段者，在年号之末另设“××年间”目统之，如嘉靖四十五年之后另设“嘉靖年间”一目。

八、引用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有学集》卷三一《隐湖毛君墓志铭》”，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无篇名者则省略，如“《艺苑卮言》卷三”。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太函集》卷二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引用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传”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或“《明史》李攀龙传”，不标卷次。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只标明卷次。如“四库提要卷一五三”。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一”。据类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如“《太平广记》卷二〇《阴隐客》（出《博异志》）”。引用报刊，注明年月日或卷次。

九、作者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有些作家，虽生年在上一卷，但在上一卷无文学活动，其小传酌情移入本卷首次出现时。如杨士奇，元亡时才4岁，其小传置于明前期卷，出生时只交代：“杨士奇（1365—1444）生”，不列小传。现、当代作者，因传记资料常见，相关作家小传酌情收录。

十、对于某一作家的总体评论和重要著录一般置于卒年。某作者卒年在下一卷，但在下一卷无重要文学活动，主要评论材料酌情置于本卷。如易顺鼎（1858—1920），其评论材料集中于晚清卷，不入现代卷。

十一、作家代表作一般不录原文，但收录重要评论材料，并酌情说明相关选本收录情形。

十二、需要补充交待而占用篇幅较大的文学史事实，设少量“附录”。对若干需要辨证的史实，设按语加以说明。以提供文献线索为主，不详加征引。



绪论

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唐人选唐诗新编·河岳英灵集》卷首）

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冉）集序》：五言之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著于李、苏，盛于曹、刘，其所自远矣。当汉、魏之间，虽以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虽去《雅》浸远，其丽有过于古者，亦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得其门而入者，当代不过数人。（《全唐文》卷三八八）

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华）中集序》：帝唐以文德敷祐于下，民被王风，俗稍丕变。至则天太后时，陈子昂以雅易郑，学者浸而向方。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常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于时文士驰骛，飙扇波委，二十年间，学者稍厌《折杨》、《皇苓》而窥《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识者谓之文章中兴。（《全唐文》卷三八八）

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唐兴，接前代浇漓之后，承文章颠坠之运，王风下扇，旧俗稍革。不及百年，文体反正，其后时浸和溢，而文亦随之。天宝中作者数人，颇节之以礼。（《全唐文》卷五一八）

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唐有天下凡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若乃其气全，其辞辨，驰骛古今之际，高步天地之间，则有左补阙李君。君名翰。（《全唐文》卷五一八）

白居易《与元九书》：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鲂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颀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



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迨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白居易集》卷四五）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摸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稹集》卷五六）

刘肃《大唐新语》卷八：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余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唯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孰为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若施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装，衣之绮秀，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罪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笋，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

同上书卷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开元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王智明、金吾卫佐李玄成、进士陈居等注《文选》。……智明等学术非深，素无修撰之艺，其后或迁，功竟不就。

皇甫湜《谕业》：夫比文之流，其来尚矣。自六经子史，至于近代之作，无不备详。当朝之作，则燕公悉以评之。自燕公已降，试为子论之：燕公之文，如榱木栱枝，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燮阴阳而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许公之文，如应钟鼗鼓，笙簧鐃磬，崇牙树羽，考之宫县，可以奉神明，享宗庙。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延亘平野，如云如风，有貔有虎，阗然鼓之，吁可畏也。贾常侍之文，如高冠华簪，曳裾鸣玉，立于廊庙，非法不言，可以望为羽仪，资以道义。李员外之文，则如金辔玉鞶，雕龙彩凤，外虽丹青可掬，内亦体骨不饥。独孤尚书之文，如危峰绝壁，穿倚霄汉，长松怪石，倾倒溪壑，然而略无和畅，雅德者避之。杨崖州之文，如长桥新构，铁骑夜渡，雄震威力，动心骇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若数



公者，或传符于帝宰，或受命于神工，或凤翥词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攘袂班、扬，皆一时之豪彦，笔砚之麟凤。（《全唐文》卷六八七）

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复，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焉。（《全唐文》卷八〇七）

皮日休《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贞观、开元，其传者醜，其继者浅，或引刑名以为文，或援纵横以为理，或作词赋以为雅，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皮子文藪》卷九）

高彦林《唐阙史序》：皇朝济济多士，声名文物之盛，两汉才足以扶轮捧毂而已，区区魏晋、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记者多矣。贞元、大历以前，捃拾无遗事。（《唐阙史》卷首）

刘昫等《旧唐书》职官志二：翰林院……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武德、贞观时，有温大雅、魏徵、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皆召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词召入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号北门学士。天后时，苏味道、韦承庆，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独当书诏之任。睿宗时，薛稷、贾应福、崔湜，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垰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

同上文文苑传序：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近代唯沈隐侯斟酌《二南》，剖陈三变，摭云、渊之抑郁，振潘、陆之风徽。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洽，不独子建总建安之霸，客儿擅江左之雄。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赉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蕡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玗翠羽，自成华彩，置之文苑，实焕缃图。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已下，为《文苑传》三篇，凯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

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恻怆可以察于声。……盖诗者，乐之苗裔欤！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得其正始。宋齐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时，子昂、李、杜、沈、宋、王维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而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由是而下，得者时有，而不纯焉。（《欧阳修全集》卷七二）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唐元次山铭》：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几于三代之隆，而惟文



章独不能革五国之弊。既久而后，韩、柳之徒出，盖习俗难变，而文章变体又难也。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也，可谓特立之士哉！（《欧阳修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礼乐志一二：后魏乐府初有北歌，亦曰《真人歌》，都代时，命宫人朝夕歌之。周、隋始与西凉乐杂奏。至唐存者五十三章，而名可解者六章而已。一曰《慕容可汗》，二曰《吐谷浑》，三曰《部落稽》，四曰《巨鹿公主》，五曰《白净王》，六曰《太子企喻》也。其余辞多可汗之称，盖燕、魏之际鲜卑歌也。隋鼓吹有其曲而不同。贞观中，将军侯贵昌，并州人，世传《北歌》，诏隶太常，然译者不能通，岁久不可辨矣。

同上书韩愈传赞：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蛙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熏醖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

同上书文艺传序：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绋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

姚铉《唐文粹序》：至梁昭明太子统，始自楚《骚》，终于本朝，尽索历代才士之文，筑台而选之，得三十卷，号曰《文选》，亦一家之奇书也。厥后徐、庾之辈，淫靡相继。下逮隋季，咸无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繇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六义四始，一变至道。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谏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许公继以宏丽，丕变习俗，而后萧、李以二雅之辞本述作，常、杨以三盘之体演丝纶，郁郁之文，于是乎在。（《唐文粹》卷首）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九：唐武德初，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太宗……著令者十部：一曰燕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声辞繁杂，不可胜记。凡燕乐诸曲，始于武德、贞观，盛于开元、天宝。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又有梨园别教院《法歌乐》十一曲，《云韶乐》二十曲。

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西汉时，今之所谓古乐府者渐兴，晋、魏为盛，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余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鲜矣。士大夫作者，不过以诗一体自名耳。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词话丛编》本）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以时而论，则有……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沧浪诗话校释》本）

张炎《词源》卷下：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词话丛编》本）

郝经《一王雅序》：隋大业间，文中子依放《六经》，续为诗书，骋骥骤而追绝轨，



甚有意于先王之道，乃今坠灭而不传。李唐一代，诗文最盛，而杜少陵、李太白、韩吏部、柳柳州、白太傅等为之冠。如子美诸怀古及《北征》、《潼关》、《石壕》、《洗兵马》等篇，发秦州、入成都、下巴峡、客湖湘、《八哀》九首、伤时咏物等作，太白之《古风》篇什，子厚之《平淮雅》，退之之《圣德诗》，乐天之《讽谏集》，皆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中声盛烈，止乎礼义，扶去污剥，备述王道，驰骛于月露风云花鸟之外，直与《三百五篇》相上下。惜乎著当世之事，而及前代者略也。（《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八）

方回《瀛奎律髓》卷一：陈拾遗子昂，唐之律祖也。不但《感遇》三十八首为古体之祖，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俱同时，而皆精于律诗。孟浩然、李白、王维、贾至、高适、岑参与杜甫同时，而律诗不出则已，出则亦足与杜甫相上下。唐诗一时之盛，有如此十一人，伟哉！（《瀛奎律髓汇评》本）

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唐初承陈、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颓靡不振。张子寿、苏廷硕、张道济相继而兴，各以风雅为师，而卢本之、王子安务欲凌跨三谢，刘希夷、王昌龄、沈云卿、宋少连亦欲蹴驾江、薛，固无不可者，奈何溺于久习，终不能改其旧。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声八病之嫌矣。唯陈伯玉痛惩其弊，专师汉魏，而友景纯、渊明，可谓挺然不群之士，复古之功，于是为大。开元、天宝中，杜子美复继出，上薄风雅，下该沈、宋，才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矣。并时而作，有李太白宗《风》、《骚》及建安七子，其格极高，其变化若神龙之不可羁。有王摩诘依仿渊明，虽运词清雅，而萎弱少风骨。有韦应物祖袭灵运，能一寄秣鲜于简淡之中，渊明以来，盖一人而已。他如岑参、高达夫、刘长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属，咸以兴寄相高，取法建安。至于大历之际，钱、郎远师沈、宋，而苗、崔、卢、耿、吉、李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黄初，诗道于是为最盛。（《宋濂全集·潜溪后集》卷四）

高棅《唐诗品汇》总叙：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侈之于终。至于声律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同上书五言古诗序目：五言之兴，源于汉，注于魏，汪洋乎两晋，混浊乎梁、陈，大雅之音，几于不振。唐氏勃兴，文运丕溢。太宗皇帝，龙凤之姿，天文秀发，延览英贤，首倡斯道，其《幸庆善宫》等作，时已被之管弦，明良满庭，赓歌赞治。若夫世南属和，匡君以正；魏徵终篇，约君以礼。辞之忠厚，岂曰文为？及乎永徽以还，“四杰”并秀于前，“四友”齐名于后，刘氏庭芝（按即刘希夷）古调，上官仪新体，



虽未遏其微波,亦稍变乎流靡。……神龙以还,品格渐高,颇通远调。前论沈、宋比肩,后称燕、许手笔,又如薛少保之《郊陕篇》、张曲江公之《感遇》等作,雅正冲澹,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又:唐诗之变,渐矣。隋氏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

同上书五言律诗叙目:律体之兴,虽自唐始,盖由梁、陈以来俚句之渐也。梁元帝五言八句已近律体,庾肩吾《除夕》律体工密,徐陵、庾信对偶精切,律调尤近。唐初工之者众。王、杨、卢、骆四君子以俚句相尚,美丽相矜,终未脱陈、隋之气习。神龙以后,陈、杜、沈、宋、苏颋、李峤、二张(说、九龄)之流,相与继述,而此体始盛,亦时君之好尚矣。凡四时游幸,诸文臣学士给翔麟马以从,或在禁掖,或出离宫,或幸戚里,或游葡萄园、登慈恩塔,或渭水祓除、骊山赐浴,即有燕会,天子倡之,群臣皆属和。由是海内词场翕然相习,故其声调格律易于同似,其得兴象高远者亦寡矣。又:盛唐律句之妙者,李翰林气象雄逸,孟襄阳兴致清远,王右丞词意雅秀,岑嘉州造语奇峻,高常侍骨格浑厚,皆开元、天宝以来名家。……杜公律法变化尤高,难以句摘。

同上书五言绝句叙目:六言始自汉司农谷永,魏、晋间曹、陆间出。至唐初,李景伯有《回波》乐府,亦效此体。逮开元、大历间,王维、刘长卿诸人相与继述,而篇什稍屡见,然亦不过诗人赋咏之余矣。

同上书七言古诗叙目:歌行长篇,唐初独骆宾王有《帝京篇》、《畴昔篇》,文极富丽。至盛唐绝少,李、杜间有数首,其词亦不甚敷蔓,大率与常制相类。又:七言虽云始自汉武《柏梁》,然歌谣等作出自古也。……唐初作者亦少,独宋之问数首为时所称,又如郭代公《宝剑篇》、张燕公《邺都引》调颇凌俗,然而文体声律抑扬顿挫,犹未尽善。又: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故乐府歌辞咸善。或谓其始以《蜀道难》一篇见赏于知音,为明主所爱重,此岂浅才者微幸际其时而驰骋哉!不然也。白之所蕴非止是。今观其《远别离》、《长相思》、《乌栖曲》、《鸣皋歌》、《梁园吟》、《天姥吟》、《庐山谣》等作,长篇短韵,驱驾气势,殆与西山秋色争高可也,虽少陵犹有让焉,余子琐琐矣。揭为正宗,不亦宜乎!又:王荆公尝谓:杜子美之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所作,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骋若泛驾之马者,有澹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籍若贵介公子者。盖其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后来无继也。余观其集之所载《哀江头》、《哀王孙》、《古柏行》、《剑器行》、《溪陂行》、《兵车行》、《洗兵马行》、《短歌行》、《同谷歌》等篇,益以斯言可征,故表而出之为大家。又:盛唐工七言古调者多,李、杜而下,论者推高、岑、王、李、崔颢数家为胜。窃尝评之:若夫张皇气势,陟顿始终,综核于古今,博大其文辞,则李、杜尚矣。至于沉郁顿挫,抑扬悲壮,法度森严,神情俱诣,一味妙悟,而佳句辄来,远出常情之外,之数子者,诚与李、杜并驱而争先矣。

同上书七言律诗叙目:七言律诗,又五言八句之变也。在唐以前,沈君攸七言俚



句已近律体。唐初始专此体，沈、宋等精巧相尚。开元初，苏、张之流盛矣，然而亦多君臣游幸倡和之什。又：盛唐作者虽不多，而声调最远，品格最高。若崔颢，律非雅纯，太白首推其《黄鹤》之作，后至《凤凰》而仿佛焉。又如贾至、王维、岑参早朝倡和之什，当时各极其妙，王之众作犹胜诸人。至于李颀、高适，当与并驱，未论先后，是皆足为万世程法。……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如《秋兴》等作，前辈谓其大体浑雄富丽，小家数不可髣髴耳。……天宝以还，钱起、刘长卿并鸣于时，与前诸家实相羽翼，品格亦近似。至其赋咏之多，自得之妙，或有过焉。

徐献忠《唐诗品》序：唐兴，承六代之后，词华大备，讽规尚微。太宗以鸿哲之才，刚明之气，采摭余藻，济以格力，当时英贤遭遇，共谐景会，意主浑融，音节舒缓，不伤宫徵之致，其为当代之主何疑焉。开元以还，绮文之士，习气尚余；而暴乱之后，神理乏缺，虽鲜错之盛未殊，而感思之情不能无作。故其舒缓之节渐流为深密之致，而模写之言始盛矣。

同上书：或曰：唐自神龙以还，品格渐高，颇通远调。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于诗义亦同然尔。玄宗内智明朗，睿心疏畅，既新国步，遂拾词华。开元之际，君臣悦豫，钱别临游，动纾文藻，而感旧嘱芳，探奇校猎，情欣所属，辄有命赋。一时赓歌之盛，上武虞皇，下收葑藻，词人竞进，六艺争长，固已陵夸建安之迹，而泳贞观之余波矣。然贞观之初，浮靡虽去，而绮丽犹扬，殆乎垂拱之后，法章陈具，吏事深刻，人怀密志，无复疏节。先时风轨为之一变，故感惕之言易流于激，悲愤之调不吐其华，骨气顿高，风神遂委，而藻思丽情渐异往时矣。天宝之后，治人凋谢而乱梗外集，飘零奔溃，无复治朝之风，求风人闲雅之意，盖亦征（微）矣。三变之端，殆有出于此乎？（《全明诗话》本）

何景明《明月篇序》：仆始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著，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者之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固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征焉。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雉鸣》，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与？（《何大复先生集》卷一四）

谢榛《四溟诗话》卷三：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堆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历代诗话续编》本）

陈霆《渚山堂词话序》：余始著词话，谓南词起于唐，盖本诸玉林之说。至其以李白《菩萨蛮》为百代词曲之祖，以今考之，殆非也。隋炀帝筑西苑，凿五湖，上环十六院。帝尝泛舟湖中，作《望江南》等阙，令宫人倚声为棹歌。《望江南》列今乐府，以是又疑南词起于隋。然亦非也。北齐兰陵王长恭及周战而胜，于军中作《兰陵王》曲歌之，今乐府《兰陵王》是也。然则南词始于南北朝，转入隋而著，至唐、宋昉制